

青花波斯文筒式三足炉

见证中西文化交流

曾在山西博物院展出的青花波斯文筒式三足炉，是一件特殊的香炉，它是有明纪年的完整的明代“空白”青花瓷标准器。目前所存，全世界只有两件。

明朝正统、景泰和天顺三朝30余年，政局动荡，官窑瓷器多不书年款，民窑瓷器带年款的也不多见，致使人们对这一时期瓷器的面貌认识不清，称之为“空白”。而这件青花波斯文筒式三足炉，炉底款书“天顺七年大同马”，年代正是明代天顺七年，即公元1463年。

香炉外形清新大雅，迥异于古法与古意，外壁书有青花波斯文三段，其内容节选自诗人萨迪的《果园》，诗中这样写道：“谦逊的智者宛如一棵树，挂果越多枝头越弯曲。”通俗直白地告诉我，越有大智慧者，做人越和谦虚。

这件文物向我们印证了古代海上丝路的繁荣。从405年到1433年，郑和28年间七下西洋，先后到过30多个亚非国家和地区，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、赤道以南，天索马里的摩加迪沙一带，再一次掀起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高峰。

郑和七下西洋，主要货物有瓷器、香料、茶叶、丝绸等，交流的主要对象为伊斯兰世界，这件白底蓝花装饰效果的青花瓷筒式三足炉正是那个时代的见证。

香料从上古焚香祭祀到作为大宗交易品，从宫廷权贵的享受而演变为民间活动，串联成中国人爱香、敬香的脉络。时至今日，香文化已日益融入普通民众生活，成为联接古代文明的纽带，也正顺应了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潮流，以及“一带一路”的开放合作精神。在新时代中让“互学互鉴”的精神传承不衰。

来源：山西博物院



上图为青花波斯文筒式三足炉；下图为炉底款书“天顺七年大同马”。

原始八卦图

凌家滩遗址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凌家滩村，约5000多年前为一处大型新石器时代晚期聚落。其出土的玉版上的图形，是目前可见的最早的八卦。

据上古传说，《周易》和《洪范》来源于河图、洛书。传说伏羲时，有龙马从黄河出现，背负河图；夏禹时，有神龟从洛水出现，背负洛书。《周易》云：“易有太极，是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。”玉版图形中的四方和八方，正与以上四象和八卦的概念相合。四象和八卦，在季节概念上，就相当于农历的四时八节。玉版图形表现的有可能是远古的洛书和最早的八卦(见图)。

远古没有文字，人们使用钻孔、画圈的办法计数，以代替五行交替时节转换。因此，河图、洛书就是历法，凌家滩出土的玉龟和玉版，几乎可以证实5300年前就有这种历法存在，也反映了我国夏代或夏代之前的律历制度。历法的出现表明当时的农业已经得到大发展，玉版上的圆形就是一个例证。玉版上的大圆和小圆，特别是小圆的左边弧度很不平整。古凌家滩人为什么不把它画圆呢？按照古凌家滩人琢玉的技术，琢一个圆很容易。原来，在凌家滩，春夏秋冬，日出时太阳都显得很圆，日落的时候，刚开始，太阳也显得非常圆，但逐渐往下落，太阳就像玉版上的小圆一样不那么平整了。玉版上的大圆小圆是用写实的手法表现太阳一天的运行。

张敬国



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

《强渡大渡河》



强渡大渡河，是指1935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在四川省越西县(今属四川省石棉县)安顺场渡过大渡河的战斗，也是长征途中的一次著名战斗。强渡大渡河是红军的一次生死之战，能否渡过去，是中国革命的关键。红军勇士们正是凭着对中国革命的无限忠诚，抱着必胜信念，发扬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，不怕困难，不怕牺牲，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向河对岸冲去，并成功地后续部队打开了一条通道。红军部队成功地强渡大渡河，17名勇士在作战中的英雄壮举，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。

傅抱石的国画《强渡大渡河》再现了红军长征途中强渡大渡河的场景，表现了红军英勇无畏的精神。

1935年5月上旬，中央红军长征从云南省皎平渡巧渡金沙江后，沿会理至西昌大道继续北上，准备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。蒋介石紧急调兵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，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南攻北堵，围歼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。

5月24日晚，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一带开始强渡大渡河。安顺场原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北渡失败之处，两侧高山，中间河谷，无回旋余地，四川军阀曾扬言红军将重蹈石达开覆辙。红一军团袭占安顺场渡口，歼敌两个连，缴获渡船一只，控制了南岸渡口。25日，刘伯承、聂荣臻亲临前阵阵地指挥。17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，冒着敌人密集火力，奋勇渡过大渡河，击退川军的反扑，控制了渡口。

1951年，为表现红军勇士勇往无前的精神，画家傅抱石创作了国画《强渡大渡河》。傅抱石详细查找

资料，采访老红军战士，凭借扎实的国画基础和高超的艺术想象力，仅用几个月的时间，完成了这幅经典作品。在画面构图中，汹涌的大渡河水礁石、悬崖峭壁几乎占据了画面所有的空间，一艘载满红军战士的小舟正朝对岸驶去。这艘小舟在大自然面前显得极为渺小，似乎马上就要被汹涌的河水吞没，但仍奋勇向前。画面中，整齐的船桨排列在船侧，船头站立的一人正挥手指向前方，画家通过视觉传递，表达出红军战士奋勇向前夺取胜利的信念。

傅抱石用他特有的笔法，描绘大渡河湍急的水流，近现代美术史和中国画的创作论里把这种笔法叫做“抱石皴”。居于画面中心的一叶小舟，飘荡在惊涛骇浪之中，画家采用了俯视的视角，更加剧了这种险势。傅抱石通过光影效果的处理，表现了大渡河上险峻的浪涛、河对面山峰的险峻，展现出一种戏剧性的冲突。这种光影效果不是传统文人画的湖光山色，而是极具冲击力的天光水色。

长征已经过去八十多年了，大渡河的波涛依然汹涌，大渡河两岸人民的生活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今天，伟大的长征精神依然鼓舞着我们在新征程上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！

本版收集整理

美术经典中的党史

“村人民政府”印章



几年前，由于编写《武家庄村志》，收集到两份村民保存的分家析产契约，均为麻纸手书。一份写于1952年7月12日，另一份写于1953年4月8日。两份契约的共同之处，是盖有一方形公章，印文为“太原市武家庄村人民政府”。其后，又在村民高枫处，得见公章原物。除方形印章(边长为60mm)外，另外还有印文一模一样的椭圆形(长轴60mm，短轴40mm)、长方形(边长为31mm和115mm)各一枚。三枚印章均为木质，字为繁体，刻工相当粗糙。

在我国历史上，明清两代曾在村一级实行过里甲制、保甲制、都甲制等多种制度形式。到1917年，阎锡山在山西废除都甲制，推行区村制。以村为单位，设立村长，实行自治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，村一级分为行政村和自然村。凡大一点的村，均为行政村，设立村长，实即一级行政机构，也即我国最基层的人民政府——村人民政府。上述三枚印章，正是在这一时期刻制并使用的。

1954年9月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。9月20日，大会通过了第一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。

在这部宪法的第二章“国家机构”中，行政区划只划分到“乡、民族乡、镇”这一级，并规定在这一级设立“人民委员会”，同时明确“人民委员会”即“人民政府”，是“国家行政机关”。这部宪法，对村一级组织并未涉及，实际上，已否定了村一级“人民政府”的存在。

同时，合作化、公社化，相继进行。在农村，合作社(一开始是初级社，后来是高级社)的牌子没挂几天，就又换上了生产队、生产大队的牌子。这些原本是生产性、经济性的组织，同时长期担负着行政事务。直到1982年宪法确认了“村民委员会”的法律地位，随后1988年6月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通过，全国绝大多数农村都成立了村民委员会。而直到今天，村民委员会也只是“村民自治组织”，并不是一级政府。

可以说，那个叫“村人民政府”的政府，只存在于短短的三四年时间，早已被人们淡忘了。而那几枚“村政府”的印章，却被最后的掌管者及其后人精心保存了下来，已有近七十年，真是难能可贵。

郝妙海

古人曾有“万般皆下品，惟有读书高”之语，对读书的重视可窥一斑。古人读书的目的高下不一，或报效国家，或建功立业，或光宗耀祖，或博取名利，主要途径就是参加科举考试。

科举制度是封建时代的人才选拔形式，吸收了大量出身中下层社会的人士进入统治阶级，有其进步性和合理性，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封建政治；科举的一整套严密的考试程序和制度，更被誉为是中华民族杰出创造。但是，科举制度也有其消极性，尤其到后期，以八股取士，束缚了思想，阻碍了科学发展。

科举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有着深远而广大的影响，上至庙堂之高，下至江湖之远，诸如“金榜题名”“状元及第”“五子登科”等以科举为题材的绘画、书法、雕刻等作品随处可见。

编者

科举文物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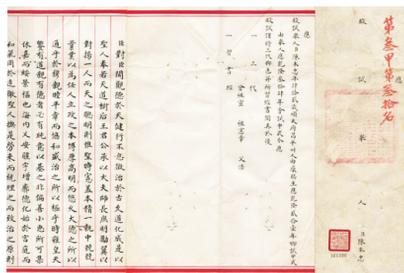
殿试图(作者、年代不详)



明代“状元及第”镜



清康熙青花五子登科图印盒



清乾隆年间科举殿试试卷(局部)

画说汉字

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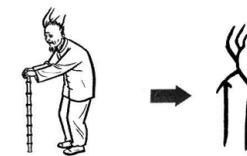
考

甲骨文

篆

隶书

楷体



一位头发稀疏的驼背老人，拄着拐杖慢慢前行。

“考”字本义为年老，与“老”字相同。在甲骨文和金文中，“考”字的字形都像一位头发稀疏的驼背老人拄着拐杖在慢慢前行。可见，“考”字是一个象形字。同时，它还是一个以“老”为形符，以“丂”(kao)为声符的形声字。古代将去世的父亲称为“考”。现在，“考”有很多含义，如考察、考试、考究、考核等。

《康熙字典》编者前